



国学研究丛书

華中國學

張勇詩題



(第二卷)

主 编◎罗家祥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张勇诗题



(第二卷)

主 编◎罗家祥

靜而後能動
 知而後能行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
 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
 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
 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
 後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
 均為一理。至本至末。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 2013 年度学术论文选集,内容包括政治史、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社会史、古文字学、古典文献学等国学研究的各个分支,涵盖了历史学、文学、哲学、语言学等四个学科,集中展现了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最新学术成果。所选文章立意高远,视角独特,观点新颖,资料翔实,视野宽广,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国学研究领域的先进水平。

本书主要面向科学研究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也适用于广大文史爱好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中国学(第二卷)/罗家祥 主编.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609-9648-6

I. ①华… II. ①罗… III. ①国学-文集 IV. ①Z126.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7542 号

华中国学(第二卷)

罗家祥 主编

策划编辑:周小方 钱 坤

责任编辑:刘 烨 刘 亭

封面设计:李 嫒

责任校对:周 娟

责任监印:周治超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5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0.5 插页:2

字 数:67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6.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学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天瑜 朱 雷 刘献君 张岂之 杨叔子 张勇传
邢福义 宗福邦 葛剑雄

主 编

罗家祥

副主编

程邦雄 雷家宏 李耀南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小南 王兆鹏 华学诚 刘真伦 张三夕 李传印
杨 果 冻国栋 吴根友 赵国华 黄朴民 郭齐勇
阎步克 黄树先 董恩林

执行主编

夏增民



总序

General preface

近 30 年来，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举世震惊的经济成就，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巨大进步，飞速发展的国力提升，迎来了史诗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也为实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伟大复兴与飞跃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神州大地蔚为大观的“国学热”，正是在这一宏伟的背景下出现的。

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之所以重新得到如此热烈的关注，原因就在于其本身具有不可估量的独特价值。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世界上唯有古老的中华文明经过数千年风雨坎坷，非但没有消亡，而且从未中断，成为当今世界人类共同珍视的宝贵财富和智慧源泉，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之所以如此，传统中华文化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中华文化又具有哪些独特价值？以中华原典中最具代表性的《老子》和《论语》为例，虽然它们具有的价值取向似乎有所不同，即所谓出世与入世，但却有着共同内核，这就是“和”的理念。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这一理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过积极的作用；而当代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老子》和《论语》无疑也是最重要的本土的思想宝库。中华文化向来注重以人为本的“天人合一”，强调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自然一体；讲究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时遵循“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和“守弱居柔”的规律；信守中庸之道，深怀忧患意识以及“不争”与“无为”，“不争”即“天下莫能与之争”的“不争”，“无为”即“无所不为”的“无为”，这些文化特质所表现出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都是中华文化贡献给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生物得到稳定的延续靠的是基因的遗传，又靠基因的变异得到发展，而人类社会的“基因”则是文化。文化本质上就是人化，即以文化人，以人化物。过去留下的东西就是文化，这里既包括有形的，又包括无形的，人类社会就是靠文化的传承才得以延续，又靠文化的创新才得以进步。民族文化是民族的基因。中华文化所凝现的民族精神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哲

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一直产生着巨大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如今，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雄姿迈入 21 世纪，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显得尤为迫切。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是中华民族根基。因为一个民族的特性不取决于遗传的自然基因，而是取决于人文文化，只有人文文化才能彰显一个民族的身份。如果一个民族遗弃了自己固有的文化，丢失了自己的传统，那将只是一个种族，不能称之为民族。在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高速发展和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先进科学，没有现代技术，就会落后，一打就垮，痛苦地受人宰割；然而，没有民族文化，没有人文精神，就会空虚和异化，则会不打自垮，甘愿受人奴役。因此，没有科学技术进步就绝没有社会进步，但只有科学技术进步，那这个社会就是很危险的；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很落后，这个社会也是很野蛮落后的；如果一个社会科学技术很进步，而精神文明非常落后，这个社会将是灾难性的。毫无疑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人文文化是第一生产力的动力源、方向盘。中华民族要全面而迅速地实现伟大复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固有的人文与传统，其意义不言而喻。

人们可能要问，在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否能与现代社会兼容？中外无数事例表明，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人文精神和智慧不仅不会与现代社会产生冲突，而且还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奇特的效果，即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传统文化也可发挥出巨大作用。日本明治维新后，有一位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一生创办了 500 多家企业，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金融之王，他 80 多岁退下来之后，在日本财团开办的讲习班上专门讲他如何用《论语》来办企业，堪称毕生将中华文化、《论语》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完美结合的典范，也是中华原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巨大作用的经典案例。直至今日，他的五世孙、日本著名的投资者涩泽健还在强调他的哲学名言：“商业的发展必须以社会伦理为根基，否则会把人引入歧途。企业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给社会创造财富。”这是利与义多么紧密的结合。此外，我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以及其他东方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说明，古老的中华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完全可以做到既背靠五千年历史文化，又坚持三个面向。

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中华民族要形成强大的竞争力，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更大的作为，就必须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而要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拥有大量的创新型人才和健全而良好的国民素质就是最基本的前提。在这方面，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认为，人文对科学至少有三大作用。首先，人文为科学发展指引方向。科学求真，但科学不能保证其方向完全正确。无数的事例证明，20 世纪科技的高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严重负面影响。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科学需要人文导向，人文的提升当然也需要以科学为基础。其次，人文为科学提供了动力。事实证明，只有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进行完美的结合，才能结出符合

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之果。在我国近代化进程中，这样的范例不胜枚举。20 世纪享誉中外的我国老一辈科学巨子如华罗庚、苏步青、茅以升、李国平等以及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丘成桐等在国学方面均有极高的素养，这不仅深刻影响着其人格风貌、精神境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们在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功；而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则将其在物理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直接归因于国学大师胡适。第三，人文为科学开辟原创性源泉。科学讲逻辑，讲分析、解决问题，但科学中最重要的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就需要直觉和灵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直觉、灵感、想象力从哪里来？科学教育固然有其重要的一面，但更多则来自于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可以培养出高尚的人性和高级的灵性，科学创造是离不开人的人文素养的。因此，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应该占有重要地位。

从处于转型过程中的我国社会现实需要看，通过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建设当代文化、构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已刻不容缓。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近 20 年来在不同场合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强调中华民族文化对创新的重要性，如在 2006 年 1 月，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谈到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关系时，深刻阐明了中华文化与创新的关系，提到中华文化含有丰富的创新内容，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006 年 11 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文联、作协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每一次飞跃、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烙印。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中华文化对增强民族创造力、自信心和凝聚力，对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

我国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纵深发展，社会上许多十分严重的隐忧与显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显得极为重要和空前迫切，而中华文化中的许多精华养分则是亟待继承、弘扬的。举例来说，我国几千年来强调信守仁、义、礼、智、信，显然是可以纳入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予以继承和弘扬的。所谓“大忠大爱是为仁，大孝大勇是为义，修齐治平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对当前的诚信建设与道德建设显然特别有着无可置疑的积极意义。何况，通过弘扬优秀中华文化，陶冶国民感情，启迪国民智慧，提升国民素质，增强国民的凝聚力与创造力，其意义非同一般。

以上所讲只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与感受。当然，挖掘几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并使之产生积极影响，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与共同努力，需要大批专业工作者扎扎实实的辛勤耕耘。同 20 世纪初比，当代意义上的国学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指中华传统文化本身，而且还应包含近代以来借鉴西方学术、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也需要本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博大的胸襟、更深远的抱负，肩负起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责任和使命，为当代我

国的文化建设付出更多的努力。

近 10 年来,我校国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已成为一道亮丽的学术景观;2009 年 4 月,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宣告成立,本学科的发展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值此凝聚着大家心血的《华中国学》问世之际,谨致衷心的祝贺,更寄以深厚的期望!

最后应声明一点,我只是一名工科教师,由于种种原因,介入了国学研究之内,然而毕竟大非内行,所讲的不对之处,希望读者特别是本领域专家批评指正,我不胜感谢。

是为序。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杨品子

二〇一二年九月一日



前言

Preface

华中科技大学于 2008 年正式发文成立国学研究院后，所有同仁便有一心愿，即编辑出版国学辑刊，使之成为反映我校研究成果的园地。最初的想法是分门别类，逐年一辑。于是，2008 年岁尾，国学研究院组建国学辑刊编辑委员会，出版过一部主要反映我校历史学研究成果的集子，冠之以“中国历史文化论集——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辑刊第一辑”，由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后来经过多次商议，编委会调整了原有思路，历经近两年的筹划和各位同仁的辛勤劳作，从形式到内容均有所改变的《华中国学》(第一卷)终于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

收录在这本集子的论文，均为我校国学研究院同仁的研究成果。鉴于目前学界对“国学”一词内涵和外延的诠释见仁见智，故未按经、史、子、集研究予以分类，也未按时下通行的学科领域进行处理，而是根据本校各位同仁的学术专长、根据此次所辑论文的内容进行了大致的划分。若干篇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因系本校历史所教师劳作的产物，也一并收录。这些成果中有些已在相关刊物上发表，有的则是作者提供的近作。如果这些作品能得到学界各位师友、各位同仁的关注、批评与指正，将不胜欣慰与荣幸！

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到《华中国学》的编辑出版，我们要深深感谢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学界前辈、学校领导和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对人文学科的关心、爱护、支持与扶持。我校国学研究院成立庆典举行于 2009 年 4 月 11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叔子先生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为参加这一活动，退掉原先订好的返程机票，重新订票，赶回学校时已是凌晨，并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做了主题讲话；校党委书记路钢教授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参加成立大会并发表高屋建瓴、热情洋溢的致辞；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教授因 11 日要赴京参加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遴选，于 10 日专门打电话到我家中对国学研究院成立表示祝贺，并对他不能与会表示歉意；原校党委副书记、对我校文科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刘献君教授更是全程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任中国

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教授，原西北大学校长、哲学家、历史学家张岂之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家朱雷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家萧汉明教授，武汉大学语言学家宗福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家邢福义教授，历史学家熊德基教授等近 70 名著名专家学者或发来贺信，或莅临大会发表重要演讲；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水电能源学家张勇传先生则欣然为国学研究院题写了院名。没有他们各种形式的关心与支持，我校人文学科是不可能发展到如今这一局面的。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位德高望重、具有非凡人格力量的学界前辈，一位深具战略眼光和充满人文情怀的教育家，一位一辈子并不以人文学科为工作对象但又时时刻刻对人文学科念兹在兹、一往情深的卓越科学家，这就是前文已经提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杨先生毕生耕耘于机械工程领域，在同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交叉研究中，特别是先进制造技术、设备诊断、信号处理、无损检测新技术、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的应用等方面均有独创性的贡献，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居功甚伟，1991 年获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但是，他对人文学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始终倾注了满腔的热忱，真正是不遗余力地以各种形式予以关心和支持。除前述参加国学院成立大会的感人事迹外，杨先生为本辑刊的出版所展现的人格风范、人文情怀与高尚情操更使我们增添了难以言表的感戴之情。卷首这篇 3500 字的“总序”是杨先生在抱病卧床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完成的，其间数易其稿，初稿及二稿上到处是密密麻麻的改动文字。须知，先生已是 79 岁的老人，且此类不情之请不仅不是他应做的工作，也为撰写“总序”时的健康状态所不容许，是完全可以避开的。先生独特的人格风范、宽广无私的胸襟、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满腔热情和古道热肠实在是摄人心魄，令人永远难以忘怀！

《华中国学》(第一卷)得以顺利出版，还得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姜新祺先生，以及策划编辑周小方女士和钱坤先生，没有他(她)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热爱以及注重发展本校人文学科的情怀，这套辑刊纳入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并如期问世，是不可能的。此外，历史研究所夏增民博士、陈文龙博士在论文整理归类、规范体例及编辑文本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谨此一并致谢。

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二〇一二年九月三日



目录

Contents

论国学的学格及其评价标准·····	谢贵安 (1)
“儒”的文化史考察·····	黄朴民 (9)
庄子“知”论·····	李耀南 (16)
西汉儒学传播二题·····	夏增民 (33)
从《中庸》诠释看当代儒学的多元开展·····	廖晓炜 (48)
楚礼研究刍议·····	杨 华 (62)
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	邓小南 (71)
北宋公主之楷模：李遵勗妻献穆大长公主（上）·····	何冠环 (101)
杨时与两宋之际的王氏新学·····	罗家祥 (128)
弄璋弄瓦：宋人产育中的性别选择·····	杨果 陆溪 (141)
“钱俶赂赵普”年代考·····	徐晓光 (150)
《宋史·礼志一》所载大中小祀制度源自《天圣令·祠令》说 ——附论北宋前中期若干大中小祀制度的系年·····	陈文龙 (156)
北宋孔道辅研究三题·····	全相卿 (167)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解诂·····	程邦雄 (178)
语言：认知世界的方法和结果——哲学语言札记·····	黄树先 (186)
中国古典小说“对仗”结构与两极美学·····	张跃生 (197)
论表时间的“去”字·····	何洪峰 (209)
王灼八督州考·····	岳 珍 (218)
《九店楚简》相宅篇发微·····	刘金华 (233)

诸葛亮用人思想新探——以杨洪、张翼受抑为个案研究·····	白 杨 (241)
柳宗元吴武陵交游考·····	马晓斌 (251)
朱震及其《汉上易传》述评·····	唐 琳 (263)
试析《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对明儒薛瑄《读书录》的影响·····	朱 冶 (277)
戴名世《史论》的史学理论价值·····	李传印 (284)
《书目答问》所见张之洞学术文化思想略论·····	雷家宏 (294)
康有为和孙中山大同思想之比较·····	李 琼 (303)
孙德谦《太史公书义法》的史学价值·····	汤 黎 (310)
后记·····	(317)



论国学的学格及其评价标准

谢贵安

国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具有中学、民学和通学相兼的学格特性，虽属「一国所有之学」，却具有变通性和选择性。在当今专科纷立的学术格局下，国学成为一种拥有会通、圆融和综合特性的学问，并具有克服专学「一科一段」之弊的意义。既然国学属于通学，因此不应以专学的标准来评价，而应确立以「会通」取代「专精」、以「软伤」取代「硬伤」的评价体系。只要各自确立了自己的学格和评价标准，国学与现代分科之学可互为前提而并行不悖。

国学与国运相联。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人自信心增强,国学热潮也再度兴起。与此同时,对国学的概念、体系、价值进行探讨的论著层出不穷,与本文有关的论文,主要有江凌《试论国学和“新国学”》^①、林藟《“国学”概念的历史梳理及当代定位》^②、扎拉嘎:《谈谈国学概念的逻辑推证与今学话语优先权问题》^③和秦进才《“国学是通学”的历史思辨》^④等文。但本文与上述论文的主要观点不尽相同,故特作论述如下。

一 国学的学格

每一种学术都有自己的学格,国学既然作为一门学问或学科,就得拥有相对独立的学格,否则很难称之为“学”。所谓学格是某一种学术的基本特质,关乎其学术的本体论问题。国学的学格是什么,一直未有精确的定义,以致此前国家教育部在确定国学的学术分类和地位时,举棋不定,最终没有将国学纳入新的学科目录。曾有学者建议在新的学术分类目录中,在历史学一级学科门类下,增设国学一级学科;有的学者则建议在哲学门类下,增设国学一级学科,但均未获得采纳,至今仍留下重重疑窦。那么国学究竟有什么特质,国学的学格是什么,换言之,它之为学的理由何在?对此,笔者有以下三点认识。

首先,国学是中学,不同于西学。

国学是在20世纪早期、清末民初兴起的一种学术思潮和学术概念,是在西学的严峻挑战下产生的一种新的学术概念。面对西方列强的步步入侵及西学的兵临城下,国粹学派首先打出了“国学”的旗帜,他们针对“外人所慕者,莫黄人自觉若,而欲绝其种姓,必先废其国学”^⑤的情况,以及中国士子“专崇欧语,几有不识汉文者”的现象,提出了保存国粹的主张,“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为国粹也”,“夫粹者,人人所欲也,我不保存之,则人将攘夺之,以还我之粹,而攻我之不粹,则国之不成其为国也”^⑥。但由于民国时的战争不断,中国经济遭受重创,中国难以保护深受西学冲击的国学。

1949年以后,新中国全面推行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学术形成西化趋势,国学受到较大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改革开放导致更广泛意义上的西学一波波地强劲输入,中国学术受到西方现代“三论”的深刻影响。直到90年代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才再一次形成“国学热”。显然“国学”的复兴与西学的刺激和挑战密切相关。如果没有西学的刺激,国学的概念都不会产生,更不会形成热潮,国人可能日浸其中而不察焉。

尽管国学的部分内容,也曾经是西学和外学,但经过长期的汉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佛学便来自天竺,胡旋舞来自西域等。但是,今天的西学仍十分强劲,如果不以国学来区分和抗拮,则难免会出现“全盘西化”的局面。因此,今天国学强调其中学的身份和特质,并非顽固地抗拒西学,而是实施“缓冲”,以便国学有机

① 江凌:《试论国学和“新国学”》,载《山东农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② 林藟:《“国学”概念的历史梳理及当代定位》,载《燕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③ 扎拉嘎:《谈谈国学概念的逻辑推证与今学话语优先权问题》(上、下),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3、10两日第4版《争鸣》版。

④ 秦进才:《“国学是通学”的历史思辨》,载《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⑤ 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75页。

⑥ 黄维熙:《国粹保存主义》,载《政艺通报》壬寅第22期。

会从容吸纳西学中最优秀的内容,摒除其中文化糟粕,而不至于使自己全面崩塌和陷落。

有人提出了“新国学”的概念,认为对待国学应该持有三个态度,首先应有历史的眼光、发展的态度,其次应有全球的视野和开放的态度,其三应有时代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从而将国学发展为“新国学”,并指出新国学应该注入现代社会所需的公民意识、自由观念、民主思想,寻求其社会价值和启迪意义。^①显然,这是将现代西方文化的精髓融入其中,这样做的目的实堪嘉许,但实际上有悖国学与西学相区分的初衷和特质,将国学赋予了过多的现实意义。其实,除国学之外,各种西学都渗透到现代各门人文与社会科学之中,如哲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西方文学等,用不着将国学当做万能的学问,赋予过多的内涵和功能。

其次,国学是民学,不同于君学。

国学先驱邓实明确提出:“和国学相对的是君学,后者是只知有君的伪儒之学,其弊病在于颂德歌功,缘饰经术,以媚时君,希冀富贵。”^②可见,国学之提出有其时代背景和进步意义。

国学从君学变为民学,是从近代西学逐步渗入并成为中国的君学后开始的。在古代,国学主要的内容都是君学,但清末民初国学思潮兴起时,中国的君学及其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后从“五四”到“四九”,再到“六六”,中国的君学已经西学化,传统文化即传统国学逐步退出君学舞台,特别是1949年以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研究文史哲的大部分学者用唯物论方法研究中国学术,使中国学术迅速“西学化”,国学被君学扫地出门,“国学”之名及其学问隐没不彰,只在民间潜滋暗长。

21世纪被西方某些人称之为“中国的世纪”,也正是在此世纪到来后,国学发展更加迅猛,但这种发展并不是上层推动的(直到今天,国学的学科地位也未获官方承认),而是由学界和民间发力的。各地出现了许多读经班,讲《孝经》、“四书”、《老子》、《孙子兵法》等,大学和社会各机关则延请学者举办各种国学讲座,还出现了中国传统礼仪的培训和训练。学界试图将国学推行到企业管理高层,办过一些国学班和国学讲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纷纷开设国学院。但总体上看,国学都不再被视为统治之学,也未受到官方高层的重视,没有像“马工程”那样倾国家之力予以支持,而多由学术机构和民间自发推动。国学仍然保持着其民学的特征。

其三,国学是通学,不同于专学。

1906年,国粹学派的创始人邓实指出:“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③“至于国学的内容,则是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一句话,国学即是神州之学。”^④可见,国学是以中国“一国所有之学”为其研究对象,注重于经史子集的整体研究。

诚如邓实所言,中国传统学术虽有经史子集之分,但并未形成十分明确的此疆彼界,国学大家都是各部兼通的大师。像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初三大儒”和王鸣盛、

① 江凌:《试论国学和“新国学”》,载《山东农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② 邓实:《国学真论》,载《国粹学报》,第27期。

③ 邓实:《国学讲习记》,载《国粹学报》,第19期。

④ 邓实:《国学真论》,载《国粹学报》,第27期。

钱大昕等乾嘉考据大师，基本上是各学兼通的。钱大昕在经学、史学、子学和集学上都有研究和成就。经学上与修《音韵述微》，提出“古无轻唇音的”学说，史学上与修《热河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撰著《二十二史考异》、《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宋学士年表》、《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子学上与修《天球图》，并撰有《三统术衍》和《十驾斋养新录》、《余录》等，集学上撰有《潜研堂文集》和《元诗记事》等。可见，中国传统学术并不特别强调学科和专业化，而突出其融通的意义。在传统国学体系下，没有专门之学一说，只有通学体系下个人学问的爱好和偏向，即因人而异的擅长。像钱大昕显然属于国学通儒，偏重史学，于元史尤为擅长而已。

作为通学，国学的经典与专学的经典是不同的。国学经典只以十三经、前四史、春秋战国诸子之书为经典，这些“中华元典”是国学的共同经典。而专学经典则各不相同，如隋唐史这种专门之学的经典，首推《隋书》和新旧《唐书》，明清史的经典，则非明清《实录》和《明史》、《清史稿》莫属，宋代哲学专业的经典，则有程朱文集和《朱子语类》。国学以贯通和融会为特色，虽在研究上因人而异和有所侧重，但它与专学不同，重视的仍是国学共有的经典。整个古代社会，无论是擅长史学还是偏重文学者，仍然强调十三经、前四史的经典作用和基础价值。

国学的学格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通学，这与现今各专业学科以专学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础是截然不同的。专业学科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仍然有其顽强的生命力；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越分越细，彼此隔绝，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耕耘自己的“一亩二分地”，不放眼更广阔的学术领域，因此才有打破分科格局、复兴国学的呼声。国学应该肩负将传统学术融会贯通的历史使命。

对于国学的通学性质，并非所有人都持赞同的态度。秦进才便反对国学的通学性质。^①《光明日报》做了一期访谈，有学者指出“国学是整体之学”；“国学的特色，就是综合性的通学”；“国学是通学，是整体之学、博雅之学”。^②但遭到秦氏的驳斥。他认为国学中的核心经学并非一直是个整体，而是由统治者与儒家多次整合才形成的；从中国学术史看，学术有分析专精，亦有综合博通，并非总是通学形态。其实，我们现在谈国学的学格，实际上是以当下国学为何迅速崛起这一事实为起点进行讨论的。国学在现代学术分科格局下再度复兴，实际上是对分科专学的纠偏补弊，具有一种通学的性质和意义。

其实，国学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种选择性学问。国学的“一国所有之学”的优势，使它能够各种风云激荡的时代，从容地进行内容取舍与整合。国学与君学相对，曾指超越统治之学的所有学问；与西学相对，曾指中国固有之学问，即国故。后来，随着君主专制的土崩瓦解，与西方殖民势力的日益侵袭，国学日益倾向于保存国粹，渐渐等于“国故”^③。又由于宋学即理学多倾向于宣扬纲常伦理，不免有“君学”之嫌，因此，国学又多指汉学(朴学)，一度具有固守传统的文化守成主义特质，从而受到了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激进主义的抨击。今天救亡图存已不再是国人的奋斗目标，国学也不再会因固守传统而遭受诟病，那么当下的国学究竟应以什么样的面貌示人，其内容和体系怎

① 秦进才：“‘国学是通学’的历史思辨”，载《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② 《国学是一门学科》，载《光明日报》，2009年10月12日。

③ 《辞海》指出：“国学，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5页。)

样进行选择呢？笔者认为，既然国学不再负有 20 世纪初期反西学、反君学的政治任务，当前的迫切任务是纠正专学片面和学术分割之弊，那么国学应该强化其会通的特质，凸显其通学的学格。分科之学的弊病是一旦形成专学(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便固定不变，而国学虽然讲究综合和统一，却随机变化和因人而异，有较大的灵活性。

二 国学的评价标准

既然当今国学在选择性整合后，突出了通学的特质，那么国学的评价标准便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对于国学的评价标准，笔者认为应该重视会通，而对专精稍作放松；与此相应，应该重视软伤，而对硬伤不再苛责。因为专精的要求，是对领域相对狭小的专学而言的，硬伤的要求，也是基于可控的专门之学而言的，若仍对范围广泛、以通为特质的国学课以专精，责之以硬伤，那就不免缘木求鱼，出现苛责国学的毛病，使通学与专学同时处在衡量专学的同一评价体系中，使国学大受其伤。在当今国学教学的实践中，笔者发现，国学班的学生仍由文、史、哲中涉古专业的导师指导，甚至答辩时也与专门之学的学生一起，评价论文的标准仍然是以是否专精和是否有硬伤，这导致国学班的学生被认为论文空疏、不扎实、漏洞多、缺乏严谨。这显然是将国学当做专学来看待，将国学学生当做专业学生来培养，其结果是抹杀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对于国学的评价标准，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1. 以会通取代专精

国学既然以通学为特质，那么它的评价便应该以“会通”为主要标准，而以“专精”为辅助标准。

会通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特色，即国学的特质。会通就是将经、史、子、集之学融会贯通，既有扎实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基础，同时又能将各部之学贯通，从而达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效果。所谓“会通”是从《周易》的变易贯通观念发展而来的一种人生态度^①和学术思想。“会通”最初的意思是察阴阳以观“会合变通”，然后引申为对经典本身的“融会贯通”。宋人纵康义即撰有《周易会通正义》^②。“会通”再进一步扩大到沟通不同学派和不同类别的学术。东晋李充试图将“会通”赋予沟通儒、道的内涵。他在《学箴》中称：“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义化之，行仁义之不笃，故以礼律检之；检之弥繁，而伪亦愈广，老庄是乃明无为之益，塞争欲之门。夫极灵智之妙、总会通之和者，莫尚乎圣人。”^③北魏时甄琛曾著有《会通缙素三论》，试图将僧俗加以沟通。^④“会通”还具有贯穿古今的含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提出了会通的主张：“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⑤这直接影响到郑樵的会通主张。郑樵

① “会通”作为人生态度，有随事处理、灵机应变的含义。如《晋书·桓温传》桓温欲乘石虎死时北伐，上疏曰：“今主上富于阳秋，陛下以圣淑临朝，恭己委任，责成群下，方寄会通于群才，布德信于遐荒。”《辞源》在解释此词时谓“随事处理”。又《元史·儒学一·许谦传》：“其处世不胶于古，不流于俗。不出里闾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门为耻，缙绅先生之过其乡邦者，必即其家存问焉。或访以典礼政事，谦观其会通，而为之折衷，闻者无不佩服。”此亦随事处理的意思。

② 《宋史·艺文志一》。

③ 《晋书·李充传》。

④ 《北史·甄琛传》。

⑤ 《汉书·司马迁传》。